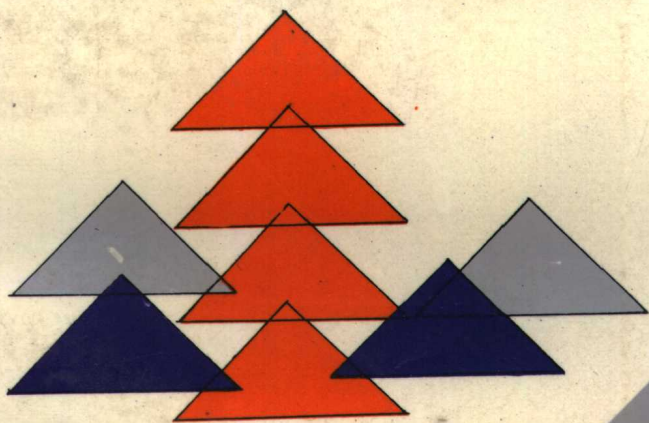


XIANDAI
JIAOYU
CONGSHU

丁 钢 著

中国佛教教育

儒佛道教育比较研究



四川教育出版社
· 现代教育丛书 ·

丁 钢

中国佛教教育——儒佛道教育比较研究

四川教育出版社·一九八八年·成都

责任编辑：金成林 李定凯

封面设计：戴 卫

版面设计：刘 江

中国佛教教育——儒佛道教育比较研究

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8.125插页4 字数160千

1988年4月第一版 1988年4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500册

ISBN7-5408-0385-1/G·348 (软精) 定价：2.49元

内容提要

本书比较系统、全面地论述了中国佛教教育发生、发展的历史源流和主要特点，并从比较文化的角度，从中外文化交流、斗争融合的角度对儒佛道三家的教育思想、制度和方法进行对比研究。同时还论述了近现代中国佛教教育，藏、傣佛教教育。全书观点鲜明，内容丰富，史料翔实，填补了中国教育史研究领域中的一块空白。

序

我国目前正处在一个伟大的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变革时期。党的十三大已经为我们指出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要实现这条路线，教育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赵紫阳同志在报告中强调：“从根本上说，科技的发展，经济的振兴，乃至整个社会的进步，都取决于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和大量合格人才的培养。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因此教育如何改革才能与经济、政治、乃至整个社会的改革相适应，已成为举国上下所共同瞩目的问题。

教育改革只有在科学的教育理论的指导下才能不断引向深入。虽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教育理论工作者已经对教育改革的问题作了不少理论探讨，应该说我们的教育理论研究还是相当薄弱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体系的建立决非朝夕可致。可能需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我们的理论体系才能逐渐臻于完善。

今天，在老一辈学者的关怀下，由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大型教育科学学术著作系列丛书——《现代教育丛书》，与广大教育理论工作者以及我们工作在教育第一线的广大教师见面了。

丛书的作者队伍是由一批中青年教育理论工作者所组成。他们思想敏锐、勇于探索、敢于创新、富有朝气，他们以自己辛勤的研究成果，为教育理论界吹进了一股新风。

这套丛书以运用新学科、新方法、新观点进行理论探索的教育科学著作为主，同时注意挖掘我国传统教育的瑰宝，填补教育理论研究的空白，适当介绍外国教育理论的新成果。强调学术性、科学性和理论联系实际，力图为开阔教育理论研究的视野，开拓教育实践的沃土，启迪教育改革的思考，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科学体系，促进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作出努力。如果丛书能始终保持较高的质量，这个目标是一定能实现的。

刘佛年

1987.11.7.

前 言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多元结构。

它主要由儒家文化，道家（或道教）文化和佛教文化构成，在中国漫长的历史文化发展史中，儒家文化是正统，道家（或道教）文化是异端，而佛教文化则是外来的鲜货。然而，文化发展的规律证明，凡是适应社会生活需要的一切文化成果是可以并行不悖、彼此相容的。在这前提下，不同的文化可以有各自的独立性，但也可以相互吸收和融合。中国文化的历史正是如此。儒家注重人伦，道家崇尚自然，佛教提倡出世，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满足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共同需求。因此，在彼此的斗争与融合中，相辅相成，相互补充，甚至相得益彰，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基础。

与此相适应，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份，中国传统教育也是一个多元结构。它主要也是由儒家教育，道家（或道教）教育和佛教教育构成。儒、道教育历来受到中国教育史界的关注，佛教教育却由于它的宗教性质而甚少有人注意。实际上，

每种文化都是由人类创造的，文化的流传又是通过人类一代一代相继延续的，而文化的延续绝对离不开教育的传递。因此，佛教文化的传递也必然由一定的教育形态来保证，于是就有了佛教教育的出现。

中国佛教教育的产生和发展是与中国传统的儒道教育紧密相关的。它起始于东汉，是在适应儒道教育的基础上兴起的。由于它以精致的教育思想，以及对教育心理与思维训练的注重，为中国古代的传统教育输入了新血液，因而得到一定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在政治社会种种因素的促动下，佛教教育不断地迎合和吸收儒道教育，在长期的融合过程中，逐渐分离出一个具有中国化特征的佛教教育体系，在教育制度、思想、方法等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并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改变了儒道教育的进程与方向。至隋唐，随着佛教中国化的完成，佛教从教育制度、思想和方法等一系列方面全面确立了中国佛教教育的体系，广泛地影响了中国的传统教育。它在近代有了新的发展，而且垄断中国某些少数民族（如西藏、云南傣族等）地区的教育。

中国佛教教育的历史说明，它在其发展过程中，不仅具备有一整套完备的体系，而且事实上，它的产生与发展已成为中国古代传统教育的一个重要的有机组成部份，它对儒道教育的吸收和影响，历史早有明证。它在中国教育发展史乃至文化史中的地位与作用是无法忽略的。

然而，在中国封建社会的特定历史环境中，三教教育的历史地位不尽相同。由于在满足封建政治伦理需求上的程度不同，一方面构成了以儒家教育为主流，佛道教育为补充的局

面；另一方面，随封建社会的变动沉浮，三教教育此起彼伏，又形成了一幅错综复杂的历史图景。

由此，在研究中，一方面要采用比较教育研究的一般方法，即跨国性的研究方法，通过考察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接触史，来比较研究佛教教育与中国固有的传统教育的关系；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摸索一种探求在同一国度文化环境中各种不同教育形态、体系之间相互关系的比较研究方法。

本书就是从以上的思考角度和方法出发所作的一项新的尝试。它力图通过对中国佛教教育发展史的纵向考察，以及与中国传统儒道教育的横向比较，以期为中国教育史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角度和观点、方法。这种尝试无疑面临着众多的困难。然而，正是这种种的困难激发了作者的探索的兴趣，并将此引以为己任。因为，对于一位青年学子来说，有什么能比攻克难关更令人神往呢！

作 者

一九八六年冬日于沪上

《现代教育丛书》顾问及编委名单

(按姓氏笔划为序)

顾问:

冯元蔚
顾明远

刘佛年

任宝祥

胡晓风

主编:

张诗亚

张俊洪

查有梁

编委:

丁 钢

王伟廉

毛祖桓

巩其庄

吴定初

吴忠魁

杨 彬

张诗亚

张俊洪

赵中建

查有梁

徐 辉

扈中平

黄新宪

程方平

覃光广

翟大林

目 录

前言

第一章 佛教教育的兴起·····	1
一、伊存授经：一个有趣的文化现象·····	1
二、讲学以译经——佛教教育的初兴·····	5
三、东汉帝侯的隆佛与教育·····	10
四、早期佛教教育思想剖析·····	15
五、“禅定”与“守一”：佛道教育思想比较·····	21
第二章 融合与分离（上）·····	31
一、三教融合与佛教教育·····	31
二、车子、康僧会三教一致的道德修养论·····	40
三、由朱士行到法显：求法留学运动之始·····	44
四、讲学之风大盛：南北两大中心长安与庐山·····	50
五、名僧与名士：寄寓于玄谈中的佛教教育·····	55
六、竺道生对佛教教育的影响：佛性说与顿悟说·····	61
第三章 融合与分离（下）·····	72

七、南北朝学校制度中的佛教教育	72
八、僧尼制度与寺院教育	76
九、都讲制度与复讲制	79
十、其它教学形式的演进及对儒家的影响	85
十一、比丘尼教育的兴起	95
第四章 全面确立时期	100
一、隋唐的宗教政策与佛教教育	100
二、隋唐佛教的传授制度与教育	111
三、佛教讲学仪式的确立与俗讲的出现	117
四、玄奘：求法留学运动的再兴	125
五、隋唐三教教育思想的比较	129
第五章 禅林讲学制度	
——寺院制度与书院制度比较	143
一、禅林与书院的组织形式	144
二、寺院清规与书院学规	157
三、寺院与书院的教学活动及其特点	166
第六章 余绪与发展	180
一、概述	180
二、明代佛教教育思想与外学	182
三、清末民初的寺产兴学之争与寺立学校	194
四、居士佛学教育与近代思想	196
五、民元以后佛教专门学校的创办	204
第七章 中国少数民族的佛教教育	213
一、云南傣族的佛教教育	214
二、西藏地区的佛教教育	220

附录一 中国佛教的宗教美育·····	230
附录二 中国佛教教育在国外·····	241
后记·····	245

佛教教育的兴起

一、 伊存授经：一个有趣的文化现象

佛教最初传入中国，一般来说有两条路线^①。一是南传佛教。这是当时印度阿育王举行佛教第三次结集后，由印度向南传入斯里兰卡、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等国家的佛教，我国南境所传佛教，就在这波及范围之内。二是北传佛教。由于南传佛教传入中国比较晚，从历史上看，中国实为北传佛教中心。公元前三世纪，印度阿育王时期大兴佛教，加强对外的弘传。印度佛教也逐渐流传于印度西北地区。当时的大夏、安息等国一个个地加入了佛教文化圈内。

大夏国在兴都库什山与阿姆河之间，于公元前三世纪下半

^①据今学者考证，认为主要路线约有三条：一由印度，通过丝绸之路，经中亚传来；二由海上丝绸之路，经中南半岛传来；三通过西南丝绸之路，经缅甸传来。参见宋肃瀛：《试论佛教在新疆的始传》（《向达先生纪念论文集》）；陈炎：《西南丝绸之路》，《中国建设》杂志（英文版）1986年9期。本文仍沿用通常说法。

叶独立建国，深受希腊文化影响。在公元前约130年被大月氏征服。公元一世纪大夏的新统治者把势力范围扩大到印度西北部。此后大夏成为佛教的一个中心。

与大月氏建国几乎同时，汉武帝派遣张骞等人出使西域的来往日益频繁。西汉末年西域各国来华的外交使节、侍子，及其商人逐渐增多。这不仅沟通了内地与西域之间的生产技术，商业贸易方面的来往，并且为思想文化的交流铺平了道路，提供了渠道。一种新的文化接触开始了。佛教文化也在此时开始传入汉地。关于北传佛教对中国的渗入，从现有的文字记载来看，传说不下十余种，但大多荒诞不经，讹舛四出，不能置信。可其中有一条记载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并且同我们所要讨论的中国佛教教育的起始问题相联系。

在《三国志·魏志·东夷传》注引三国时魏国鱼豢的《魏略·西域传》上有这样一段记载：

“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二年），博士弟子景庐（《魏书·释老志》作“秦景宪”）受大月氏使伊存口授《浮屠经》。曰复立（《世说新语·文学》注引“复豆”）者，其人也。《浮屠》所载临蒲塞、桑门、伯闻、疏问、白疏问、比丘、晨门，皆弟子号。”

中国佛教史家一般认为，此段史料是印度佛教文化传华的最早的尤可确实的文献记载。这说明在西汉末时印度佛教信仰已在社会上引起重视。但是，更使我们感兴趣的是大月氏使者口授佛经予博士弟子这么一个非常有趣的文化现象。我们认为

这绝非是一种历史的偶然事件，其背后蕴藏着一种历史的必然性，为说明这点，必须从汉时文化教育背景上去理解。

西汉的博士制度自汉武帝时，在奉行“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文教政策下，专为儒家经典的传授所设。在太学中，教授经典的博士与博士弟子构成师生关系。汉代的经学教育，无论是官学还是私学都非常讲究守师法与家法。不敢越雷池一步。如西汉孟喜从田王孙学“易”，因改师法，就被太学拒之门外，不得立博士。据此推理，博士弟子自然也不得学习门外之学。但细究之，其实不然。从汉昭帝时，博士弟子日益增多，说经者日众，经说也就越加详密。从师法与家法关系看，师法是源，家法是流，师法家法是干枝之别。凡通一经大师，经朝廷首肯尊为博士，他所传授的经说，便可为师法。而由他的弟子加以章句形成的小流派，便可为家法。于是，“虽曰承师，亦别名家”，演绎下去，便造成“经有数家，家有数说”的局面，结果是师法与家法的不攻自破，不能不出现超越樊篱的现象。这反映出文化发展在内部矛盾的运动中得以长进的自身规律。如此，一方面导致了通经立说，标新立异，进取仕途的腐败现象，另一方面也为冲破师法与家法门户，接收外来思想文化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

其次，由于官学的发展，汉武帝时博士弟子已增加到三千人之多。学生一多，教堂少和讲堂少的矛盾就突出，于是，太学的教育采取两个措施。一为安排正式课程，称为“正业”，一为增加课外的自修，称为“居学”。允许博士弟子向校外的学者讨教学习，客观上也为接受经学之外的思想文化提供了制度上的条件。

再次，自秦以来，方士幻术盛行，在方士与儒生的共同推进中形成的谶纬神学，更是广泛流行于两汉之际，成为一时的风尚。这种文化背景也为佛教的传入，铺垫了道路。

以上三方面的背景，说明了佛教文化传入的文化基础，和佛教教育的可能性。

从前引史料记载来看，也证明了这一点。引文中曰“复立”者，可能即《世说新语》注引文中的“复豆”。《酉阳杂俎》卷二“汉所获大月氏复立经”之谓，当即指“复豆经”。“复豆”者，与“浮屠”同音，即“佛陀”。(Buddha)在佛教流行后，《复豆经》才改为《浮屠经》。从书名上看，很可能是如以后《本起经》、《本行经》之一类专讲佛陀生平的经。据汤用彤先生考证，魏世似已收有不少佛经，而《浮屠经》当有不同的译抄本。^①处早期译经阶段，故用词很不规范。引文中所谓佛陀弟子的称号，除临蒲塞（后译为优波塞，即居士）外，可看作是魏世各种译抄本对“沙门”、“比丘”的不同译法。

佛教的《本起经》、《本行经》之类的佛经，在叙述佛陀一生的故事上，充满神秘的宗教意味。如说佛的出生是其母莫邪梦白象而怀了孕，佛陀从母亲的左胁出生，刚刚坠地便能行走七步等等。这种宗教性的渲染，恰与西汉当时谶纬盛行的神秘主义气氛相吻合。从比较文化角度来看，一种外来文化的移入，必须具备进行这种文化接触的适应性土壤。当时的知识分子经学大师们也不断地变幻学说，演绎神学，这就予佛教这种宗教文化的移入，提供了精神上的土壤。因此，作为太学学生的博士弟子能够接触《浮屠经》也就不足为怪了。

^①参见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一分第四章《汉代佛法之流布》。